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讀後

◎ 溫樂群

今年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也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在紀念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歷史性會議，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經驗的時候，胡耀邦無疑是一個無法回避和越過的歷史人物。從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到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直到中共中央總書記，十年間胡耀邦一路走來，從發起宣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新的路線方針的確定；從支持包產到戶、推進農村改革，到興辦特區、實施對外開放，直到制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全面改革起步；從主持召開理論務虛會、起草1979年葉劍英的國慶講話到主持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入總結中共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從主持制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身體力行推動黨內民主到積極宣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等等，胡耀邦不僅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跡，更以其鮮活的思想、寬闊的襟懷、民主的作風、擔當的精神所形成的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遭遇，為當代中國歷史留下了諸多的困惑和遺憾。

更令人遺憾的是，至今官方沒有出版一本完整的胡耀邦傳記和一部全面的文集，雖然他的同事、戰友的文集、著作和很多的研究成果都早已面世。所幸的是，由盛平主編的《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以下簡稱《思想年譜》）或許可以填補這一空白。這部由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思想年譜》，上下卷，1390頁，字數逾150萬字，可謂是一部煌煌巨著。

10年前，為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內容包括鄧小平1975至1992年的大量講話和談話記錄、批示、書信、題詞等，比較系統地反映了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過程。全書26萬字。2004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卷，102萬字。而《思想年譜》的總字數超過了這兩部文獻著作的之和，其篇幅之浩大可見一斑。顯然，編者的目的是在目前關於胡耀邦的文獻資料，特別是他的文集尚付闕如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收集、整理和編輯胡耀邦的講話、談話記錄和重要的批示、書信、題詞等，從而記錄胡耀邦1975年至1989年的15年間的主要思想理論活動，反映出胡耀邦的思想發展過程，特別是在領導撥亂反正，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而全面真實地反映出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十年間，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起步發展的艱辛探索和曲折歷程。

初步通讀一遍《思想年譜》，並將有關部分與已經出版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陳雲年譜（1905—1995）》相對照，感到這部思想年譜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對胡耀邦的思想理論活動的記錄比較系統完整，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回避當時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力求存史存真。

《思想年譜》比較系統完整地記錄了1975年至1989年間胡耀邦的主要講話、談話、批示、書信、題詞等，對一些重要的講話、談話盡可能保持原有的內容和風格，如胡耀邦主持中央黨校工作時，創辦《理論動態》，推動思想理論領域的撥亂反正，為改革開放準備思想條件、創造輿論環境所做的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從《思想年譜》中的大量歷史文獻可以看到，從《理論動態》文章題目的選擇、內容的針對性，到寫作的風格、文章的具體修改，直到發表的時機和署名等等，無不悉心謀劃，周密部署，充分顯示出胡耀邦深厚的理論修養和政治家辦報（刊）的遠見卓識，足可以與列寧、毛澤東關於政治家辦報的論述和做法相媲美。另外，如胡耀邦1978年12月在中央宣傳系統所屬單位領導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79年1月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引言、1980年2月在劇本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曾引起巨大爭議的1985年5月與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陸鏗的談話等一些重要的文獻，《思想年譜》收入的文字幾乎都在5千字以上，很好地保存了重要文獻的完整性。

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思想年譜》中對一些重要的問題不回避當時存在的分歧與矛盾。這裏僅舉一個例子，198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聽取國家計委、經委黨組關於當前經濟形勢的彙報。會議圍繞著經濟形勢和發展速度問題產生了分歧和爭論。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只是記載了鄧小平在聽完彙報後的發言內容，主要有三點：一是充分肯定1980年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進一步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並認為八字方針的核心是調整。正是堅持了以調整為核心，才有今天的形勢。強調現在又要避免出現頭腦發熱，要堅持1980年中央工作會議以及以後確定的一系列關於經濟工作的方針、政策、辦法和一些具體措施；二是充分肯定了集中資金搞骨幹項目，認為不把資金集中起來搞一些骨幹項目，搞再多的小企業，也解決不了問題，而骨幹項目正是解決後十年的問題，是後十年用的；三是提出今後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領導經濟工作。指出：一段時間裏，我們中央的一些同志的講話，人們感到有那麼一些不一致，下面已經有些擔心。這種狀況應該結束。政出多門，下面難辦，而且對中央的威信有損害。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書記處當然要領導經濟，現在黨的領導中心任務就是這個，但是領導的方法要明確。以後財經工作，通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所謂發號施令，所謂對問題的解釋，都由這個口子，避免多頭。強調要確定這一條中央領導經濟工作的方法。¹ 字數近600字。

在《陳雲年譜》（下卷）中，也僅僅記載陳雲在會議上的發言，內容歸納為十點，包括：

- （一）1980年提出調整經濟是對的，沒有這個調整，就不會出現今天這樣好的形勢。
- （二）從「六五」計劃到2000年的20年，應分為前十年和後十年，前十年打基礎、後十年振興。如果前十年不謹慎一點，後十年就困難了。
- （三）國家財政存在赤字是確實的。對支出超過收入的部分可以用銀行投資或賣黃金的辦法來彌補，但年年這樣高下去不行。
- （四）對中央各部門不要分「信得過的」和「信不過的」。對綜合部門的話也要聽。
- （五）說「一五」時期搞156項是走了彎路，這種看法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是唯心主義。
- （六）我們現在的黃金儲備，絕大多數是1973年、1974年國際貨幣動盪時買的。中國有這麼一點黃金是必需的，不算多。
- （七）國家計委要從部門、地方集中資金，搞重點建設，否則幹不成大事。
- （八）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對財經工作都要管，都要討論，但要有所分工，有所側重，重點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 （九）對亂上項目、亂用基本建設投資的現象必須制止，否則，一年後又得被迫進行調整。
- （十）中央書記處對經濟問題要研究，但方法要改進。部門之間、地方之間、部門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很複雜，要一個一個地瞭解，特別要瞭解綜合部門的情況。會議決定，

今後中央關於經濟工作的決定一律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對外宣傳和解釋。² 字數也是近600字。

《思想年譜》（下卷）在3月17日條目下用了4000多字，將趙紫陽、陳雲、胡耀邦、鄧小平的發言都有所記載：首先，趙紫陽說，歷史的經驗是：每次都是這樣，幾年順利發展，就坐不住了，頭腦發熱，高指標，浮誇，折騰，搞不下去了，再調整。他還列舉了解放以後的幾次這樣的過程，說明1980年以後，經過調整，1981年情況好了。1982年、1983年更好，於是現在有的同志頭腦發熱，又想折騰一次。之後，陳雲作了長篇發言。他針對胡耀邦關於經濟問題的一些主張提出批評。在兩個月前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今年經濟工作時，胡耀邦發言說：要加快能源、交通和某些薄弱環節的建設，如果不從今年開始加點碼，20年翻兩番的計劃就可能落空。我們不搞浮誇風，不搞高指標，但要經過積極的努力，在講求經濟效益的條件下，爭取今年增長百分之七或者更多一點。「保四爭五」暫時不變，但不要拿來擋駕。情況變了，歷史前進了，我們的思想和工作也要跟著前進。胡耀邦主張要放開眼界看投資，把人、財、物的潛力挖出來。對財政赤字應加分析，第一要小心，第二也不要看得那麼嚴重。我們有相當可觀的黃金和外匯儲備。黃金放在銀行裏不生息，還要貼保管費，現在價格又在上升，能不能拋一點。現在銀行的錢很多，當然是好事，但不會用也不是好事。

在陳雲發言（主要內容見前所引《陳雲年譜》）後，胡耀邦表態說：「陳雲同志剛才很婉轉地向我提出了批評或者是希望，我覺得對我是很好的。我對經濟工作是不熟悉的，也說過一些不適當的話。陳雲同志特別希望我好好地研究經濟問題，我覺得是很好的，我今後要很好地注意。」³ 鄧小平聽完彙報後作了總結性的發言（主要內容見前所引《鄧小平年譜》）。筆者之所以大量引用三本《年譜》中的記述，意在比較說明《思想年譜》中這樣的記載，使讀者能夠更多地瞭解到陳雲、鄧小平發言的針對性，更全面瞭解到胡耀邦、趙紫陽、陳雲、鄧小平的主要觀點和彼此之間的分歧，可以更加真實地反映出歷史的本來面貌，從而可以管窺當時中央高層決策的一些特徵。類似的記載，在《思想年譜》中還有多處。

二·對一些重要講話、談話的背景、影響及其意義和價值，對尚存在爭論的歷史節點，進行了梳理，並以注釋或提示的方式表述出來，力求思想與實踐相統一。

對於大多數的讀者來說，閱讀如《思想年譜》這樣的文獻資料，最困難的可能是對複雜的歷史背景、一些重要思想的影響和它的理論意義在理解和認識上存在一定的難度，這無疑會影響乃至削弱《思想年譜》的歷史價值。而且，作為一位政治家，胡耀邦的重要講話、談話及其提出的思想理論觀點，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指導性，如果僅僅將其講話、談話的內容加以羅列，很容易沖淡甚至割裂思想與實踐在歷史發展中的辯證統一關係。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思想年譜》的編者採取了一種頗具創新的編纂方式，即在正文中，以「注解」的形式，將胡耀邦一些重要的講話、談話的背景、影響、意義和價值，作了一些概括性的提示和說明，極大地有助於讀者對文獻（特別是文獻背後）的真實歷史的理解。這類注解性的文字，大體分為幾類：

一是，對一些重要思想和理論論斷提出的背景的介紹和說明。如1975年8月上旬，胡耀邦主持《關於科技工作的彙報提綱》一事，《思想年譜》在大量引用這個文獻的主要內容，同時也作了不少的注解。在《彙報提綱》概括了中國科技事業2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肯定「科技戰線上的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科技人員和廣大職工，辛勤努力，做出了貢獻，成績是主要的。」之後，注解說明：「這個問題涉及到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科技戰線的估計，是黑線專政還是紅線為主，是修正主義統治還是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四人幫』全面否定

十七年，……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始終是鬥爭的一個焦點。《彙報提綱》對這個問題當然無法回避，但出於鬥爭策略考慮，胡耀邦提出，這裏可不用『十七年』，而用『二十多年』。二十多年當然包括十七年，其用意是很明顯的。」⁴ 這樣不僅說明了《彙報提綱》的針對性，而且也指出了胡耀邦的政治鬥爭藝術。

二是，對一些重要思想和文獻的影響、意義的介紹說明。如，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向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彙報科學院工作並討論《彙報提綱》，在此注解說明：「鄧小平對《彙報提綱》提出的觀點是肯定的，國務院會議上也通過了這個提綱。鄧小平特別指出，這個檔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學院，對整個科學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門也起作用。鄧小平後來還曾對提綱評價說：『彙報提綱有甚麼錯，只是不夠。當時是採取勉強能接受的水準寫的，真正解決問題就不夠。』因為毛澤東對《彙報提綱》沒有表態，而不久又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彙報提綱》中所提的一些主張和做法，沒有機會也不可能實施。但是它卻從思想上組織上為粉碎『四人幫』做了一種準備。」⁵ 概括說明了胡耀邦主持的《彙報提綱》的歷史意義和地位。

三是，補充一些重要的有歷史價值的文獻資料。如，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向葉劍英派來聽取建議的葉選寧提出的「中興三策」一事。在敘述了所提的「當前特別重要三件大事」內容後，注解說明：「1987年初，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後，又追記此事，並寫下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我同葉選寧的一次談話》，說：『……這三句話我是用心想了一天一夜的，因為便於記憶、傳播，我費了好一番心思便出來的。這幾句話，當時我告訴了家庭幾個懂的人和幾個知心的人。以後也沒有多同人講了，因為我覺得不值得再說了。胡耀邦追憶。』該檔胡耀邦交給身邊信得過的秘書秘藏18年才公之於世。胡耀邦的三條政策建議，是使中國擺脫『文革』噩夢的新隆中三策。需要指出的是，追記檔寫的是『十日』，應該是『十二日』。」⁶ 這一注解，即保存了一件重要歷史文獻，又對其中記憶有誤作了考證。

四是，對一些目前尚存在分歧和爭議的思想觀點、歷史史實和歷史糾葛，加以補充說明。在一些存在分歧和爭議的問題上，顯然編者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斷，文字敘述中也常有感情色彩，但還是注意選取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和研究文章，從不同的角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視角，對一些史實和思想觀點加以補充說明。所以，我們可以從《思想年譜》中看到趙紫陽、胡喬木、鄧力群等許多當代中國重要歷史人物的思想觀點和對一些史實的回憶，以及他們與胡耀邦之間的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看，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三·注重表現和反映胡耀邦個性特徵和人格魅力，力求真實呈現出胡耀邦的生動形象。

接觸過胡耀邦的海內外人士都認為他是一位有著個人魅力的政治家，在他身上鮮活的思想、寬闊的襟懷、民主的作風、擔當的精神以及勤奮學習、具有著深厚的理論素養等等所構成的人格魅力和一些同樣明顯的性格弱點，使他成為一位生前和身後都被議論、關注的歷史人物。《思想年譜》通過胡耀邦大量的、生動的講話、談話、批示、書信，比較充分地展現出胡耀邦的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對於進一步瞭解、認識這位歷史人物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當然，《思想年譜》在材料的搜集上還有進一步補充的餘地，在對一些問題的論斷和說明上還可以進一步斟酌，在個別條目的編排上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在若干條目的文字表述上還可以進一步推敲。但瑕不掩瑜，《思想年譜》無疑是迄今為止關於胡耀邦1975至1989年思想理論活動和政治實踐的最全面、系統、完整的歷史文獻資料，也是研究胡耀邦思想和實踐活動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對於深入研究胡耀邦和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總結歷史經

驗，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據說，《思想年譜》的編者近年來在主持「胡耀邦史料資訊網」，我們期待並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版，《思想年譜》的修訂版也會問世。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這是胡耀邦為郭沫若84壽誕所寫的杜甫的詩句，借此抒發了他對祖國、人民的摯愛和面對人生起伏、榮辱、毀譽等等坦然處之的心態，這應該也是胡耀邦政治生涯最後15年的真實寫照，這是筆者讀《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最深切的感受。

註釋

- 1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895—896頁。
- 2 《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322—323頁。
- 3 《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855頁。
- 4 《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2頁。
- 5 《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17頁。
- 6 《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30頁。

溫樂群 法學博士，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研究，著有《鄧小平之處（1904—1949）》。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八期 2008年9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八期（2008年9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